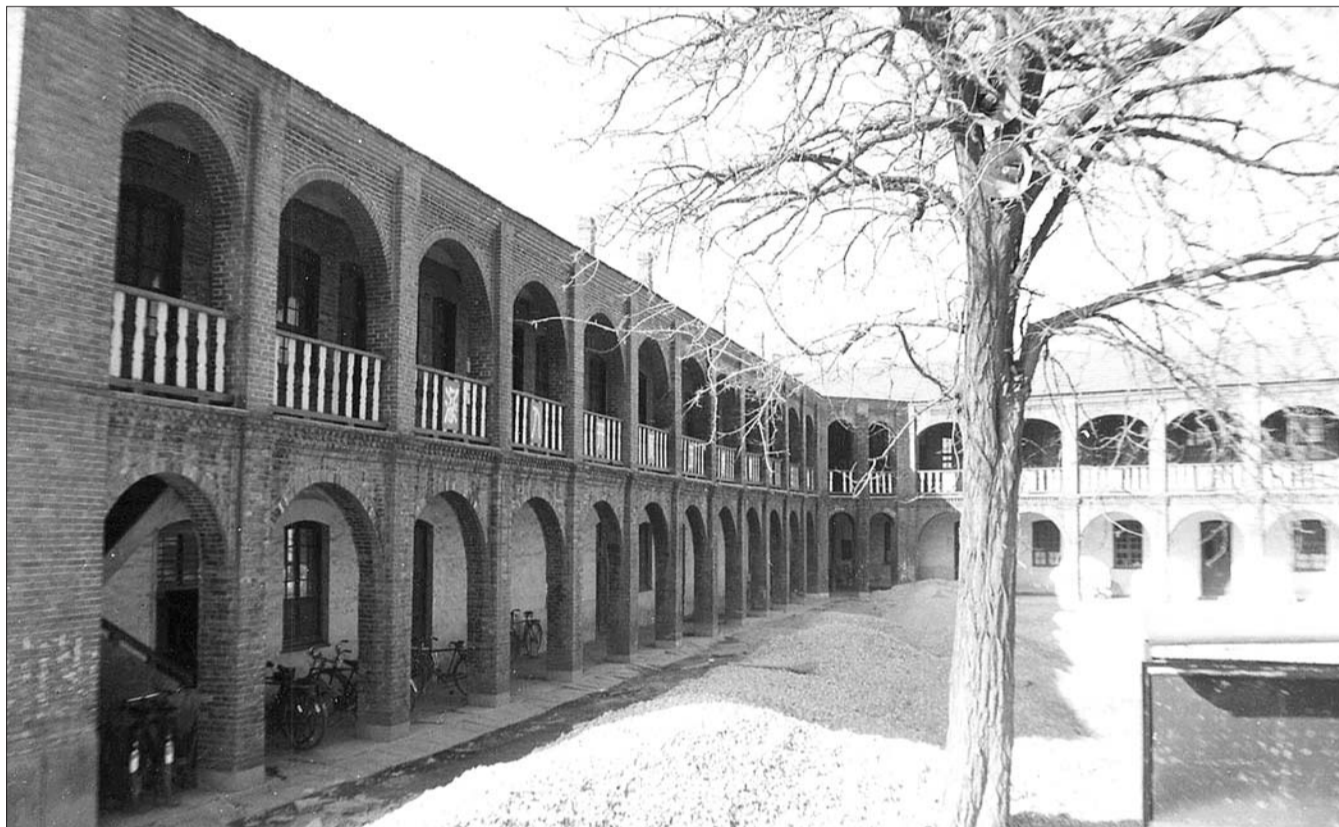


“百年中学寻访”系列之七

运河畔未停歇的济宁一中

□本报记者 汪洸 通讯员 马涛

因为古时候京杭大运河的穿城而过带动了济宁的经济发展,加之这里曾设置过“驻济宁总督河院署”(简称“河道院”)和“驻济宁山东通省运河兵备道署”(简称“运河道署”),济宁自古便被称为“运河之都”。而至1902年,这两处运河线上最重要的漕运管理机构,变身为济宁直隶州中学堂,也就是济宁一中最早的模样。翻开《济宁直隶州续志》,泛黄的旧纸张中还记录着济宁一中蹒跚学步时的履痕。时光穿越111年,济宁一中已成运河之都上璀璨的教育之星。



济宁一中太白校区的裙楼。

运河衙门上建起新式学堂

1902年,漕运中止,河道院和运河道署撤裁以后,河道院旧址由“兖沂曹济道署”进驻,在运河道署旧址,知州李恩祥委派傅承勤筹建济宁直隶州中学堂。

依原运河道署衙门建筑图及后来校友回忆,中学堂校舍保留了衙门建筑原状,有前院、二院等院落。进入大门后,两边

为花厅,院中有假山、小桥、树木等园林布置。原道署衙门的建筑基本保留,厅、堂、廊、虎等原运河道署各部门办公场所即成为中学堂办公场所。东西两厢房,改作教室之用。

最初的济宁直隶州中学堂,每年招收五六十名学生。1907年,学校曾进行过一次大修。

1937年日本军队侵占济宁后,占据了山东省立济宁初级中学的校舍。1938年秋,学校恢复办学时,被迫在渔山书院旧址栖身。

作为清末“新政”的产物,济宁直隶州中学堂聘任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教师,开设新课程,介绍新知识,在办学之初即埋下了革命的火种。学校成立

不久,在校内就出现了秘密革命会党组织——“民党”。民党是清末山东一带主要的会党组织之一。民党成员冒着杀头的危险,在学校秘密宣传推翻满清,反对专制等革命思想,秘密传播《革命军》、《猛回头》等鼓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书籍和进步刊物。

老校址铭记巨野教案

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七日(1897年11月1日),在阳谷和聊城一带进行传教活动的德国天主教士能方济和韩理加略,来

到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堂里,参加“诸圣瞻礼”。张家庄教堂的主人是德国天主教士薛田资。因教堂没有多余的宿舍,他将自己的寝室让给来客,自己睡在门房里。

谁曾想当夜二更时分,十余个手持刀棍的民间秘密组织大刀会成员越墙进入教堂院内,破窗入室,挥起刀、棍,便向床上的人击砍。不多时,方能济和韩理加略两命呜呼。薛田资则免于死,并连夜赶到济宁报案。事后调查得知,大刀会的此次活动系事前预谋,因对传教士薛田资平时传教行为不满,并与当地民众多

有冲突,故欲杀之报复泄愤。德皇威廉二世以此为借口,命令其舰队立即占领胶州湾,并强占了岸上的炮台,德国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《中德胶澳租界条约》,将胶州湾划为德国“合法”的租界地,并将山东省划为其势力范围。此后,其他列强亦纷纷效尤,争相加入瓜分中国的盛宴之中。

而位于济宁的这座天主教堂的所在地原址,就是现在的济宁一中太白校区。后来德国传教士安治泰在此处竖立大碑四座,内容记述了“曹州教案”始末。这些碑刻在国民

革命军北伐到达济宁前夕,教会方面担心碑刻会引发革命军及民众情绪激动而对教会不利,遂自行把碑推倒埋藏。

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校舍改造期间,在拆除红楼时,由楼前掘出一方碑刻,碑石已经断为两截,被拆楼的民工弃于砖石堆旁,等待与建筑垃圾一起运走。学校有一位青年老师看到以后,由碑文内容意识到它的重要性,经学校与文物部门联系,引起有关方面重视,遂将此碑收藏到济宁博物馆,使这一历史见证得以保存下来,这便是前述石碑的来历。

战时几经沉浮,革命之火不灭

至民国初期,学校先后改称“山东济宁中学校”和“山东省第十二中学校”。到1914年,“山东省第十二中学校”改称“山东省立第七中学校”,孔令灿任校长。

孔令灿先生到职后不久,即开始在原来的基础上对校舍加以重整修葺。省教育厅拨发经费3272元,增建了两间教室,24间自习室和6间寝室。经过整修,学校面貌焕然一新,成为鲁南、苏北一带名声卓著的中学。1924年,中共党员王元盛

(化名张继宽)受山东省委派遣,到山东省立七中开展工作,组织读书会等进步组织,发展党、团组织,并于1927年在省立七中组建了中共济宁特别支部,组织进步学生兴办读书会,阅读进步书籍,发动、组织进步活动,与反动势力作斗争。

到1937年,日军进逼华北,飞机数度轰炸济宁城区。山东省立济宁初级中学一度迁至汶上县孔庙,终因无法维持而被迫停办。1938年日军侵占济宁,

山东省立初级中学的校舍被强占后改作日军医院。山东省立济宁初级中学在恢复办学后,勉强在破旧的渔山书院旧址(时为“县立实验小学”,即今北门小学)上课。学校校园局促逼仄,校舍破旧不堪,还曾发生过上课期间教室坍塌,砸伤学生的事件。1941年,太平洋战争爆发后,学校迁入院门口街路南培英中学旧址(今济宁一中原古槐校区北半部)继续办学,条件虽略有改善,仍然困难重重,勉力维持而已。

日寇占我国土,残害我人民,国家蒙受浩劫,教育遭受大难,学校于夹缝之中苟延,教师与学生则以多种形式抵制日寇奴化教育,开展抗日活动。抗战时期,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先后有湖西中学、冀鲁豫第七中学等,国统区则先后有国立第二十二中学、山东省立第二临时中学。众多师长于战火纷乱之中延续教育薪火,使诸多学子得以完成学业,艰难困苦之中绵绵学风得以传承。

上世纪50年代 济南二中的老师们

□张机

2012年9月,济南二中迎来建校90周年纪念,许多耄耋老人回到母校,探望和感谢培育自己的老师们,这也让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了自己在济南二中共求学后任教的往事。

1954年的9月,刚刚考上中学的我,第一次踏进济南二中校门,那时的二中位于正觉寺街的中段,是一所初高中兼备的完中。我们那年入校的初一新生人数特别多,编成10个班,我在初10级2班。

那年我刚13岁。记得校园很大,从坐南朝北的正觉寺街正门进入,前后共有5个院落。有一天下午课间,我和一位同学漫无目的地转到前院东侧一个僻静的二层楼,好奇的我们蹑手蹑脚侧身而入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伟人画像: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的巨幅油画像,按顺序整齐地排列,画框足有近2米高。一位身穿蓝色工装的画师,正聚精会神地为毛泽东主席油画上色,他握着画笔,举着调好颜料的画板,边端详悬挂在一旁的彩印毛主席标准像,边往巨幅油画上色。我悄悄地靠前观望。中年画师浓眉大眼,两颊和唇边蓄着浓浓的胡须。一起去的同学悄悄说,这位是教美术的陈维信老师,外号陈大胡子。

早就听说二中有一位知名的画家老师,从此每到下午课外活动,我常来观看陈老师作画,后来他身边多了一位年轻人,听说是一位爱绘画的高年级学生,在他耐心指点下,能做些辅助工作,使作画进度快了许多,听说作画是为国庆献礼。这年国庆大游行时,我们学校游行队伍在前面,高擎着马恩列斯毛的巨幅画像,吸引了观看游行的人们,为众多中学的首创之举。

陈老师家住五龙潭附近的江家池街巷内,听说他经常利用周日自带画架、小马扎和干粮,到五龙潭画速写,有时竟然从清晨画到傍晚。上世纪50年代初流行穿中山装和解放装,陈老师却与众不同,一件藏青色的中式便褂,脚蹬一双黑色圆口布便鞋,骑一辆大飞轮的自行车。老师们说,他习惯独处一处闭目沉思,见他眯起眼睛,手握自制的烟斗,不愿别人打扰。

那时,济南二中文体活动开展得好,在济南相当出名,多亏有体育老师薛斌组织的篮球、排球和田径队坚持天天训练,音乐老师郑霄汉不辞辛劳组建歌咏队和舞蹈队,参加各级比赛都获得了好名次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我从外地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济南二中任外语教师。当我一心想拜会仰慕已久的陈维信老师,却听说陈老师已去北京画院工作了。李奇瑞老师(时为济南二中外语教研组组长)多次给我谈起他与维信老师的交往。1957年的那次政治运动中,他见到语文组、历史组、外语组的几位教学骨干老师都被打成了“右派”,私下说,能教书的成了右派,今后谁来教学?维信替别人鸣不平,说了几句真心话,岂料被打小报告者反映上去,受到批判又不能辩解苦闷之极。于是夜晚独自骑自行车,于学校周边从东向西往返于正觉寺街的石板路上好多趟,车轮常常夹在石板缝隙中,人从车子上摔下来,爬起来继续前行,排遣心中愤懑。

2012年8月,我参加了济南二中高16级4班同学组织的“相识五十年”师生聚会。参加聚会的35名同学都已年过花甲之年,我初中毕业的班主任、又恰是同学们高三班主任的于志英老师年届八十,学生们无不感慨我这个当年初登讲台22岁的年轻教师也变成年过七十的老翁了。